

明中晚期古本《大學》與《傳習錄》 的流傳及影響

張 藝 曇*

摘要

一門學術能夠流行並取得主流地位，其學術內容是最基礎也最關鍵的部分，但同時還必須加上一些外在的條件與優勢。明代王陽明學說之所以盛行，其中講學活動的流行，以及《傳習錄》與古本《大學》等書的刊刻流傳二事，正是王學得以在正德、嘉靖年間迅速流傳的重要助力。本文把焦點集中在後者。

明中晚期許多人因讀《傳習錄》或古本《大學》而接受王學，許多傾向程朱學的人也因此轉入王學陣營，例如在江右王學的重鎮吉安府中，包括羅洪先這些學術領袖以及不少中下層士人在內，都是透過這些書籍接觸甚至接受王學。這些書籍流布的範圍十分廣泛，對學說傳播所能發揮的效果遂甚可觀，尹臺學術的轉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也凸顯了在講學活動以外，書籍流布對學說的傳播及其對時人的影響之大。

關鍵詞：大學、傳習錄、陽明學、吉安、尹臺

一、前 言

Roger Chartier 在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中指出小冊子在資訊的傳播上發揮不可忽視的重大作用，以及這些小冊子如何將革命的理念傳播到社會的中

* 收稿日期：2005 年 9 月 30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4 月 19 日。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下層。¹而關於宗教改革時期的研究也多論及當時印刷術的進步，如何促成許多關於宗教改革的資訊更廣泛的傳播，並在社會上造成深遠的影響，而使其不致流於侷限在教士或精英階層間的辯論而已。² Mark U. Edwards 則總結一些相關研究，指出由於 Martin Luther 翻譯拉丁文《聖經》，加上當代印刷術的發達，使此一經典文本不再為一部分的人所掌握，而 Martin Luther 人人可與上帝直接溝通的理想更可能得到教士階層以外的人了解與支持，最後終於主導了整個辯論的進行問。³

若將眼光放到中國史上，兩宋以後印刷術的發達使得書籍的流傳傳播更加便利，於是學術傳播的管道除了人對人的直接傳講以外，也比以前更方便可以書籍刊刻流傳的方式進行，尤其明中期以後的經濟發展更促使書籍刊刻的數量繁增，遂使同時期的王學流傳除了利用講學的口頭傳說宣講以外，書籍的流通也發揮相當大的作用，而不應被忽略。⁴我們在討論明中晚期王學的興起與流行這件重大的文化現象時，多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如何接受了王學，以及他們如何將這套學術透過講學的方式傳播，又或者從講會與書院的舉行與興建看講學活動的興盛與繁榮，但卻常忽略掉王學傳播的對象，除了這些大思想家或者大人物以外，還有許多地方的中下層士人，處士、布衣，甚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這些人也是支持王學活動的主要成員，這些人如何接觸並接受這門學術，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我們除了注意王學學術思想的創發革新，以及講學宣揚其學這兩事以外，《大學》古本與《傳習錄》這兩本小書對王學流傳所發揮的作用也不應忽視。這三者有如鼎之三足，共同構成王學在明中晚期跨階層流行的基礎條件。

在王學風潮最盛的十六世紀，浙中、泰州與江右可說是王學的眾多學派中最具代表性，吸引最多人目光的三個學派。其中江右學派以鄒守益（1491-1562）、歐陽德（1496-1554）、羅洪先（1504-1564）、聶豹（1487-1563）等

1 Roger Charti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s. 3 and 4.

2 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N.L.B., 1976).

3 Mark U. Edwards,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chs. 1, 4, and 5.

4 關於明代出版史的研究，見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人為首，不僅在當時甚具影響力，並被視為是王學的正統所在。⁵這些江右學派的領袖人物，多數出自位於江西中部的吉安府，因此以下多以江右學派，尤其是以吉安府為主，看《傳習錄》與《大學》古本在王學的流傳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所發生的作用與影響。

二、陽明講學

宋明理學著名的特色之一即其講學活動，這些講學活動多數是由理學學者自行召集人們聚講，大體分作兩種形式，一是講會，一是書院講學，講會的舉行場所並不固定，但若人們常在某一地聚講，時日既久便有可能興建書院作為固定的講學場所。講會的靈活性強，書院的建制化程度高。

無論是講會或書院講學，都跟官方正式體制中的學校教育不盡相同，不僅講學活動中所講的內容未必與官方意識形態相合，同時也跟士人所關心的舉業內容稍有隔閡，不過這些講學活動的資金來源卻常得到官方的資助，尤其在興建書院這類大工程中，由官方資助興建的書院所佔的比例更是居高不下，據曹松葉指出，明代書院官辦與民辦的比例各為 83.17% 與 15.11%，兩者高下相差懸殊，⁶至於書院何以多為官辦的詳細原因未能盡知，但應與官方經費較為充足，在興建書院時可以公帑支出或攤派到稅賦上，尤其以公權力介入，在土地的取得與建築的維護上都較不困難有關。

講學活動之盛至少從南宋便已開始。南宋程朱學者倡導講學甚力，這些講學活動跟學校教育所代表的官學形成強烈的對比，其中朱熹（1130-1220）與陸九淵（1139-1193）二人齊集鵝湖論學又最著名，但至明初講學之風已衰，不僅舉行講會的紀錄變少，明初程朱學者在講學的態度上也已跟南宋程朱學者不同，我們雖仍可見到一些布衣、士人前往程朱學者門下學習的故事，但聚眾講學之類的事確很少見了。⁷直到明中期才有王守仁（1472-1528）及其門人弟子在各地倡導講會，興建書院，掀起新一波講學的熱潮，這也使

5 《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 333。

6 曹松葉，〈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11-115(1929)。

7 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 77。

現代學者注意到王學頗有不同於官學教育、不同於明初程朱學之處，還有人認為王學能夠迅速傳播，主要在於講學活動的倡導舉行。⁸

王學講學有其卓然特出之處，由於王學學者經常深入地方鄉里間講學，講學的對象常不侷限於士大夫或可能成為士大夫的士人群體，⁹王時槐（1522-1605）的一段話很可用來說明：

今郡邑有庠序以造士，書院之設，視庠序造士之意則一，乃其所以為造士之實，則尤大有補裨者焉！何者？蓋不專以詞藝為常課，而直以存天理去人欲，束躬勵行，而踐之人倫事物之間。……不專以位分稱師弟，而鄉之賢大夫、先生、長者，與四方之名儒碩彥皆得集焉，環聽及於童孺，訓告聞於里社。¹⁰

王時槐首先接受書院作為士人讀書考試場所的基調，來到書院的人當然以讀書人為多，但王時槐更進一步指出在書院所學的除了詞章文藝以外，還有存天理去人欲這些道德學說，於是強調「滿街人都是聖人」、人人都有良知、良知即聖的王學，遂藉此為平民百姓開了一扇門，讓這些人也有接觸王學的機會，這也是為何明中期以後不時可見一些平民百姓、農工商賈，甚至僮僕廝役參與王學講學的原因。這些講學的內容常流傳於鄉里、深入閭里基層之間，如安福鄒守益每次講學的時候，都有幾百人爭著來聽，甚至「僮僕亦樂聽其間，至有感悟卒為孝子者」，¹¹又如安福南鄉「窮山邃谷，田夫野老，莫不知有講學」。¹²至於書院之公議，不僅使得「士之居於鄉者，以薄倫為醜行，出而仕者，以黷貨為穢身」，即使是「村夫野豎，時有違忒，尤恐書院得聞而招公議之誚」。¹³

8 呂妙芬，〈導言〉，《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21。

9 余英時，〈明代理學與政治文化發微〉，《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頁249-332。

10 王時槐，〈白鶯書院志序〉，《友慶堂合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集部第114冊，卷3，頁18-19。

11 鄒德涵，〈文莊府君傳〉，《鄒聚所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卷3，頁53。

12 劉垂寶，〈復真講學記〉，（同治）《安福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卷17，頁38-39。

13 王時槐，〈道東書院志序〉，（同治）《安福縣志》卷17，頁7-8。

不過書院的空間畢竟有限，所能容納的人數不多，在此先天條件的限制下，有資格常來書院講學的人大部分還是以士人為主，有鑑於應讓基層市民百姓得到更多講學的機會，有人還主張走出書院之外隨眾聚講，也就是書院外的講會，這類講會的影響力常比書院還廣還大，如左派王學便以從事社會講學活動聞名於世。吉安王學學者中也不乏這類人物，如安福西鄉布衣賀宗孔，他因不滿於鄉里風俗的澆漓，又見書院所能容納的人數有限，因此憂心如焚，恨不得能夠「隆書院到於天」，讓每一個人都能入內聽講，也因此他一直試圖說服當地王學學者劉元卿（1544-1609）走出書院，挨家挨戶登門講學，把學術傳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¹⁴儘管劉元卿終未將他的提議付諸實踐，但賀宗孔仍利用家會與鄉會這類鄉里講學活動影響其族人與鄉人，奠定王學在當地基層的勢力。

比較讓人好奇的是，在王學初興之際，講學活動尚未大盛前，這門學術又是透過何種管道廣為流傳並為人所知？何以許多未曾聽過講學的人，一旦得知他地有王學講學，便不惜遠道前往聽講？顯然除了親身參與講學以外，人們還有其他接觸王學的管道與入口，其中古本《大學》與《傳習錄》這兩本小書便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而其刊刻流傳也對當時王學的流行起了極大的作用。

三、古本《大學》

在宋明理學八百多年的發展史中，由於四書學的興起，四書逐漸取代五經成為士人入門乃至於成學的基本書目，明初既以程朱學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正統，於是用朱熹所註釋的《四書集註》為主的許多程朱學經典，也先後成為士人獵取功名的必讀書籍之一，尤其科舉又常以四書學那一場考試定勝負。¹⁵《集註》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四書中的《論語》、《孟子》二書是孔、孟的個人語錄及其與門人弟子對話的結集，內容多屬對話性質，較無明顯可見的思想系統，因此《大學》、

14 劉元卿，〈一溪賀君行狀〉，《劉聘君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卷8，頁27。

15 林麗月，〈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0(1992): 43-74。

《中庸》這兩本相傳並非孔、孟所親作的小書在宋明兩代甚受重視，《中庸》內容偏重在心性義理的討論，《大學》則是系統完備，從個人的修身之法，乃至於將來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種種步驟都一一完整陳述，因此地位更凌駕《中庸》甚至《論》、《孟》之上。由於朱熹曾作改本，¹⁶王守仁卻棄改本而復古本，明代程朱學與王學兩門學術遂不斷集中在《大學》版本與經文解釋上相互交鋒，而《大學》也成為貫串宋明理學八百年中，最受重視、爭議也最大的一本書。

除了《大學》改本以外，程朱學還透過《近思錄》這本小書提供士人求學的指引，《近思錄》是由朱熹與呂祖謙（1137-1181）二人合編而成，全書掇取北宋五子中周敦頤、張載與二程等四人著作中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編成，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書，但已把個人的格致誠身乃至於修齊治平的工夫全部講過。¹⁷

《近思錄》在編定完成後，作為經典的地位日高，如陳淳（1159-1223）便將《近思錄》跟《四書》並提，認為這是初學入道之門，¹⁸所以我們常見士人在接觸理學之初，父母或師長便命其先讀《近思錄》，即使在成學後仍須經常回頭溫習。尹襄（1434-1526）說：「嘗聞之先正，四子者，六經之階

16 在朱熹之前，程顥、程頤分別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學〉與〈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在此之前更有鄭玄的古本《大學》與孔穎達《禮記正義》本《大學》。朱熹主要依據二程的本子再作考訂，並別為序次與補充，這使朱熹所改正以後的改本，內容介乎《禮記正義》本與二程的本子之間。朱熹的改本較諸二程的本子更凸顯了「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這三綱領的重要性，並對《大學》的內容作字句的修正，如以「新民」取代「親民」，以「此謂知本」為衍文，並斷定「所謂齊其家」的「其」為衍字。同時加上自製的「補傳」。而朱熹另作《大學章句》、《或問》，與其改本互為表裏。相關的討論，請見高橋進，《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東京：國會刊行會，1977），第4、5兩章，頁174-266。

17 陳榮捷指出，《近思錄》是我國第一本哲學選輯，也是此後《性理大全》等書的典型，《性理大全》又是明清兩代科考的根基，可謂是《近思錄》影響之擴大。而在《近思錄》之後，朱熹之友劉子澄編《近思續錄》，明末也有高攀龍《朱子節要》，皆依《近思錄》分十四目，《近思錄》的內容形式竟可支配哲學選錄之風氣達七八百年之久。請見陳榮捷，〈朱子之近思錄〉，《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123。

18 關於《大學》或《近思錄》何者應為初學入門之書的討論，請見李紀祥，〈入道之序：由「陳（淳）、黃（幹）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24(2001): 241-337。

梯，斯錄者，四子之階梯。近承先生長者之教，亦以斯錄爲先務。」¹⁹這代表了明初程朱學者對《近思錄》的基本認識，胡居仁（1434-1484）表示：「學者當以《小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²⁰也是在同一脈絡下的發言。

《近思錄》作為程朱學的入門書籍，卻不易起宣傳的作用，主要關鍵在於這本書包羅的主題範圍太廣，加上內容多半是單方面的講話與教導，因此在閱讀與理解上都較吃力，所以許多人除了應科考的需要以外，並未深入研習此書。加上當時坊間流行的版本也不一定完整無誤，如尹襄便指出，他幼時所讀的《近思錄》是當時頗爲傳布的版本，但這個版本的章節次序其實已被後人重新編次，以致決裂無章，但竟無人察覺此事，顯示當時人們並未好好讀這本書，此一現象使他頗爲震驚。²¹

19 尹襄，〈巽峰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7冊，卷6，頁15。

20 轉引自〈小學輯說〉，《小學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1），頁13。

21 尹襄，〈書近思錄後〉，《巽峰集》卷6，頁14-15。至於朱熹所編的另一本書——《小學》也是引導士人入門的書籍，但其內容卻又不只是侷限在初學入門的工夫而已，而是把初學乃至於成賢成聖的工夫全部講過。而《小學》也遭遇同樣的命運，成化年間程朱學者陳選尊信此書，並爲其註釋作《小學句讀》，但流傳不廣，年歲既久後便漸失傳。（王時槐，〈刻小學句讀後序〉，《友慶堂合稿》卷3，頁2。）廣東黃佐便指出：「子朱子《小學》，凡數十萬言，教人之道備矣。後學所當尊信，終身誦之者也。然書既浩繁，理涉宏奧，世俗訓蒙，乃或置之而以他書爲先。」（黃佐，〈小學古訓引〉，《小學古訓》，《嶺南遺書》（清道光三十年刊本），卷首，頁1。）於是有所感而作《小學古訓》，主要採取《小學》內篇中最切要者，並旁及他書。時人給的評語是：「朱子《小學》繁而詳，泰泉《古訓》簡而要。惟其繁而詳也，初學之士遽難以求通；惟其簡而要也，幼稚之童亦可以遍誦。」（方田，〈小學古訓集解敘〉，《小學古訓》卷首，頁1。）泰泉是黃佐的號。顯然即使是程朱學者也對《小學》這本書頗有微詞，至於《小學古訓》相對於《小學》雖已是簡而要了，但其內容仍然流於枝節，故流傳似亦不廣。嘉靖年間的學術官僚胡松便一針見血的指出《小學》由於「時雜大人長者之言，而非小子之所及知」，「初學小生猶苦難讀」，加上「所採傳記百家語多簡奧，加之貞婦烈女之行，宜別爲書而悉附戴」，所以「幼學病其繁」。（胡松，〈刪正小學序〉，《胡莊肅公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1冊，卷1，頁24。）而湛若水也批評朱熹當初編定此書的時候，「雜取他書，既非古書之舊」，「又其有明倫等篇，皆已是大學之事」，所以他採取「《禮記》諸篇中有小學事者」編成《古小學》一書刊行。（湛若水，〈知新後語〉，《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卷4，頁2-3；湛若水，〈古小學序〉，同前書，卷17，頁16-17。）此後，儘管胡松、甚至王學學者王時槐等人都會重新刊刻《小學》或相關書籍，但這本曾是童蒙入門必讀的書籍已漸被邊緣化，漸不再是閱讀與眾所矚目的中心了。

明初程朱學者在學術上主要守兩宋程朱學的矩矱，但更偏向內心性的探索，²²並在成、弘年間有過一段重振發展的時期，以吉安府一府先後就有永豐羅倫（1431-1468）與泰和羅欽順（1465-1547）兩位程朱學的大家，另外包括吉水的李中（1478-1542）、羅儒（1472-1534）等等，都是在當地頗有聲望的人物。不過，當時程朱學在當時遭遇一些困境。若是集中在其學說思想的部分來看，程朱學與心性修養有關的《大學》格致說與朱熹的格物補傳，其實困擾了不少士人，許多人對此都有不少疑義而不得解，而此一經典閱讀上的困難致使許多士人陷入學術的焦慮中。而程朱學者卻未必成功回應解決這些問題。此外，明初程朱學者對於講學活動與興建書院等事並不熱衷，而是抱希望於學校教育體制內的改革，²³所以如章懋與羅欽順二人還曾因共同主持南京國子監留下一段佳話，²⁴這也使其學術的流傳，相較於後起的王學更受到範圍與階層的限制。

相對於此，王守仁在倡導學術時，則是無日不聚講，即使在平宸濠亂兵戎倥偬之際仍未輟，而此講學之風在嘉靖年間更隨王學流行而臻於極盛，不僅各地書院林立，連大學士徐階等政府官員也在京師舉行靈濟宮講學。至於在講學活動未盛或王學學者的腳步所未及的地方，《大學》古本與《傳習錄》

《近思錄》的復興則是明末清初王學退潮、由王返朱的思潮興起以後的事，所以從十七世紀以後，一系列模仿《近思錄》的輯錄也陸續出現，如高攀龍的《朱子節要》、江起鵬的《近思補錄》、孫承澤的《學約續編》、劉源淳的《近思續錄》、朱顯祖的《朱子近思錄》、汪佑的《五子近思錄》、張伯行的《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等等。請見陳榮捷，〈性理精義與十七世紀之程朱學派〉，《朱學論集》，頁408-409；王汎森，〈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1997): 417-448，尤其是註4。

22 陳榮捷，〈早期明代之程朱學派〉，《朱學論集》，頁331-351。

23 如崔銑便持反對的態度，所以當時官方欲為建後渠書院，便為崔銑所婉拒，因為他更希望的是官學的改革，而非在官學之外另立書院。原文如下：「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抗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涎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濫，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崔銑，〈復河南憲司書〉，《洹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第1267冊，卷10，頁20。同樣的，羅欽順也未立書院講學。至於羅倫雖曾講學，但卻刻意選在金牛洞這個偏僻人跡罕至之地，跟後來的王學學者大張旗鼓講學的行為實不能相提並論。

24 《明儒學案》，頁1077：「弘治中，（章懋）起為南京祭酒，會父喪，力辭。廷議必欲其出，添設司業，虛位以待之。終制就官，六館之士，人人自以為得師。」

這兩本小冊子便取代講學發揮作用。

王學在知識論上與實際操作上，採取兩種不同對待文字的態度。在知識論層面，程朱學學說強調經典閱讀的博學審問，對文字的依賴較深，而王學超知識的特質，相對使其更願意擺脫典籍的糾纏，直探內在心性的本源，所以在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劃分中，程朱學尚強調兩者兼治，王學則很明白的偏向後者了。²⁵但在學術傳播這類實際的操作上，王學學者甚至比程朱學者更懂得利用文字的力量，除了在《大學》版本與解釋上與程朱學競爭經典的解釋權外，更透過《傳習錄》的廣泛流傳傳播其學術，並進一步壓縮了程朱學的空間。以下我將先討論王守仁提出《大學》古本的影響與作用。

王學學者首先在《大學》這本書作文章。兩宋理學學者大力抬高《四書》的地位，其中有系統有組織的儒學學說常須取給於《學》、《庸》二書。《中庸》內容偏向義理為多，在心性道德的探索上可提供不少資源，²⁶若論開務成物、內聖外王的理想，則非《大學》不可，尤其《大學》明列出的八步理想，更使宋明儒者對此醉心不已，這也是《大學》在宋明理學八百年的發展中受到高度重視的內在原因。

但《大學》所列出的八步理想卻有不少疑義存在，尤其「致知在格物」一句，宋明儒者聚訟紛紜不能得解。若在漢唐以經學為重的時代，這類問題即使被人發現了，也只是輕輕帶過，未必深究，但在四書學成為顯學，加上《大學》又是指示成就外王理想之書，字字句句都必須被仔細推敲琢磨，於是許多爭議也就隨之而起。大學字句文字解釋的不同，甚至還可能關係到不同學術路數、不同學派的學說基礎的不同。

這個問題在朱熹作《大學》改本時便已顯題化了。若就改本的形式來看，朱熹將《大學》分經一章，傳十章，經，是聖人所作，再由聖人弟子所口傳闡釋而成十章的傳。分經分傳的好處，在於綱舉目張，條目明晰，但其弊則在割裂文本，同時並無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動作的正當性，不免引人懷疑朱熹持何標準甚至受何天啓而知道經傳的分別？尤其是將經文改動調整次

25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 在《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322-356。

26 王守仁弟子指出，王守仁接初見之士時，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便跟《學》、《庸》兩書的性質有關。王守仁，〈大學問〉，《王陽明文集》，《王陽明全集》（臺北：大申書局，1983），卷6，頁89。

序的動作，反而為後世許多不同的《大學》改本作了示範。

再就改本的內容來看，《大學》八目明言「致知在格物」，程朱學理解格物的方式將「物」字指涉及於外在的客觀世界，因此必須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窮盡天下之物以後自然豁然貫通而得其理。儘管程朱學藉此肯定外在客觀知識的存在與價值，但同時又將此一客觀知識建立在內在心性的窮理上，因此並未為此客觀知識在其知識論上安上一個確定自明的位置。所謂一旦豁然貫通，顯然過於抽象，一般士人很難精確掌握其意。

上述問題長期困擾了不少士人，這也是在王守仁提出古本《大學》後迅速得到許多迴響的重要原因。古本《大學》出自《禮記》，在程朱學當道、四書學如日中天的時代，五經越來越被邊緣化的結果，即使有人注意到《禮記》這本書中有古本《大學》，但在《大學》改本嚴整的理論系統籠罩下，未必會把它當作一回事看，所以直到王守仁提出此編，才又受到時人的重視。²⁷而令人驚訝的是，這部《大學》在王守仁的解釋下，竟可首尾貫串，一氣呵成，完全沒有割裂的毛病，更沒有或經或傳的問題，而其八步的工夫與意義也跟程朱學有所出入。朱熹的改本把八步視為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往上攀升的過程，自個人修身始，往上是齊家、治國，最高一層是平天下，這種解經的方式很容易使人把修身、齊家視為治國、平天下的過渡階段，治國、平天下作為八步的終點。在王守仁手上，「格」被解作「正」，「格物」是「正其不正以歸於正」，於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變成一個連續不能分別階段的工夫，他不再希圖涵括自然世界的知識，而把天下萬事萬物都歸約至於一心，也因此避免了程朱學區別內外又須打通為一的困境。這篇文字被重新標舉出來，固然跟王守仁個人對古本《大學》的領悟有關，但這個作法卻對當時與後世造成相當大的震撼與波瀾。

古本《大學》的提出，其意義已不僅是書籍版本異同的問題或提出解經的新說而已，而是直搗程朱學的核心價值。若其說成立，《大學》改本勢必難以並存，而其解釋權也將落入王學學者手上，此後更將挑戰、壓縮程朱學的格物窮理乃至於其他基本學說的生存空間。這些學說的基本立場一旦動

27 直到王守仁提出古本《大學》，藏在五經中的這篇文字才受到人們的注意，所以王守仁的好友湛甘泉在談古本《大學》時還特別強調「於十三經得《大學》古本」。湛若水，〈古大學測序〉，《甘泉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卷17，頁14。

搖，更將進一步危及程朱學的學術權威。

不少程朱學者也看出事件的嚴重性，若任其發展，勢將不可收拾。在王守仁尚未明白提倡古本《大學》之前，傾向程朱學的毛憲（1469-1535）常與王守仁、湛若水（1466-1560）等人往來論學，²⁸聽聞此事後趕緊去函阻止：

間讀朱子大全，見得此老於天下事無不格，而理無不窮，真天挺豪傑，足以繼往而開來也。近聞士大夫私議門下欲改大學格字，訓爲正，又病敬之一字爲綴，豈其然乎？因風望示喻，以釋此疑。²⁹

據此可知當時士大夫間已爲王守仁的新說私相議論不已，毛憲先稱讚朱熹一番，再說士大夫對王守仁的議論可能有失真之嫌，期待王守仁能夠悔悟自清。此後毛憲還因與王守仁的大弟子鄒守益同在南京講學而論辯知行合一之旨。³⁰在吉安地區，當地程朱學者與王學學者之間也陸續發生不少論辯，如吉水程朱學者李中便於嘉靖十三年（1534）兩次致函王守仁的弟子鄒守益討論此事，第一封信還只是點到爲止，表示「近者聞一二後生慢罵宋儒，毀斥古訓，似此個習氣滋蔓，爲害非細」。第二封信便直接指出重點——「嘗見大學古本凡三家，尋繹屢年，終不能無疑，先儒更定固未爲得，今日定其爲古本，而以爲無一二之錯誤，恐未得爲得當」。³¹用字遣詞還頗含蓄。另一位程朱學代表人物羅欽順則是正面迎擊反駁王守仁的格物說，此後更與王守仁的弟子歐陽德反覆爭持。³²這場辯論最後並無勝負可言，但王守仁的古本《大學》在當時引起的震撼卻已使許多人跟隨其腳步，重新審視《大學》版本以及經典解釋的問題，並且紛紛提出己說。³³許多對朱熹《大學》改本存有疑

28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1573。

29 毛憲，〈又奉王陽明書〉，《古菴毛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7冊，卷2，頁5-6。

30 鄒守益，〈古菴子傳〉，《東廓鄒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66冊，卷9，頁10-13；〈復毛古菴式之〉，《東廓鄒先生文集》卷5，頁23-24。

31 李中，〈答鄒謙之〉，《谷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1冊，卷3，頁20、22。

32 請見《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困知記附錄〉，「論學書信」，頁108-113、117-127、166-170、171-174。

33 相關研究請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問的人，更多毅然轉向王學，大力推廣古本《大學》的鄒守益就是一例。³⁴

古本《大學》只有經文而無註釋，所以王學學者在出版古本《大學》時，除了古本的原文與王守仁的自序傍註以外，還會將〈大學問〉這篇王守仁與門人弟子討論為何復《大學》古本的大文章也一起附上，有些版本還可見到鄒守益的跋文，萬曆年間王時槐更把鄒守益與羅洪先討論《大學》的語錄也加了進去。³⁵不過全本的篇幅仍然不大。

四、《傳習錄》

從書籍刊刻的角度來看，正德十三年（1518）是十分關鍵的一年，這一年王守仁分別刊刻了古本《大學》、《傳習錄》與〈朱子晚年定論〉，〈朱子晚年定論〉後來更輯入《傳習錄》一起流傳。由於古本《大學》以及所附的〈大學問〉、序、跋、註文篇幅有限，一般人仍不易藉著這本書上手了解全部的王學學說，於是《傳習錄》這本王守仁與門人弟子論說的小書，成為人們了解王學思想的真正關鍵所在，而其影響之大更只在古本《大學》之上，至於其編定與流傳，更引起當時乃至於整個明中後期思想文化上的震動。

《傳習錄》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以《王陽明全書》中的全書本最為人所熟知，而〈朱子晚年定論〉最初則是以單篇的形式流行，後來附入《傳習錄》中。據〈定論〉卷首錢德洪序言：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著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為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³⁶

34 鄒守益的父親鄒賢，進士出身，因此鄒守益九歲便曾隨其父宦遊南京，拜見羅欽順這位程朱學的大家，並蒙其讚賞。等到他考取進士以後，雖因王守仁巡撫南贛的地緣之便前往謁見，但當時目的只在求王守仁為其父作墓誌銘，等到他聽了王守仁講學豁然有悟，表示「往吾疑程、朱補《大學》，先格物窮理，而《中庸》首慎獨，兩不相蒙，今釋然，格致之即慎獨也」，於是稱弟子。《明儒學案》，頁333-334。

35 王守仁，〈大學問〉，《王陽明文集》卷6，《王陽明全集》，頁93；王時槐，〈刻大學古本跋〉，《友慶堂合稿》卷5，頁29。

36 《傳習錄》（臺北：金楓出版公司，1987），頁239。陳來曾得日本學者所贈之《陽明先生遺言錄》影印本，而據《遺言錄》一書論其與《傳習錄》的關係，以及全書本《傳習錄》形成的歷史，請見陳來，〈《遺言錄》與《傳習錄》〉，《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

〈定論〉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攻擊當時的程朱學，利用朱熹晚年之悔來駁其「誤己誤人」，並以「己學與晦翁同」，使傾向程朱學的人更容易接受王學的新說。由於王學強調致良知，不免令人聯想到南宋專主尊德性的陸九淵之學，朱、陸異同是理學史上的一樁公案，³⁷ 〈定論〉的編定則帶有一些為陸學申冤的意思，王守仁在致汪循（生卒年不詳，1496年進士）函中說：

朱陸異同之辯，固守仁平日之所召尤速謗者，亦嘗欲為一書以明陸學之非禪，見朱說亦有未定者，又恐世之學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心，將觀其言而不入，反激怒焉。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小冊，名曰朱子晚年定論，使具眼者自擇焉，將二家之學不待辯說而自明矣。近門人輩刻之零都，士夫見之往往亦有啓發者。³⁸

汪循出身休寧，這是程朱學勢力最盛的幾個地區之一，他曾遊於程朱學者莊詠（1432-1498）之門，與王守仁曾有過幾番論辯。³⁹ 這封信應即兩人往來論辯的書信之一。⁴⁰ 如果說《傳習錄》主要在申明己說，〈定論〉則多少帶有入程朱學之室操戈的意思。⁴¹ 而從汪循、羅欽順等程朱學者亟與王守仁論辯的情形來看，此文應對當時的程朱學造成不小的傷害。⁴² 陽明後學如王叔果也輯陸九淵語錄以明其非禪，並取朱熹晚年之論相參照，合為一錄。⁴³ 張元

務印書館，2003），頁 589-604。

37 錢穆在《朱子新學案》的〈朱子象山學術異同〉篇中，反駁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論〉的謬誤所在。他指出，朱熹素主尊德、道問學兩兼之說，這個思想從中年到晚年始終一貫，因此在朱學中若有陸學所謂尊德性的部分，其實是朱陸思想本有相通之處。而王學凡遇朱熹言論可與陸九淵相通者，便指為朱熹自悔己學而改以相從，則是完全荒謬不通的說法。《朱子新學案》的書評請見陳來，〈《朱子新學案》述評〉，《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頁 221-239。關於〈朱子晚年定論〉的研究，亦可參見吉田公平，《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社，1990），III-4〈朱子晚年定論〉，頁 204-264。

38 汪循，《汪仁峰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7 冊，卷 3，頁 17。

39 《四庫全書總目》，頁 1565。

40 汪循的回信請見汪循，〈復王都憲〉，《仁峰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47 冊，卷 5，頁 15-19。

41 關於〈定論〉內容的分析，請見高橋進，《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第 2 章，頁 45-106。

42 相對的，湛若水則頗喜此文，故曰：「朱子晚年定論一編尤為獨見。」湛若水，〈答陽明都憲〉，《甘泉文集》卷 7，頁 12。

43 (萬曆)《溫州府志》(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11 冊，卷 11〈人物一〉，頁 23-24。

忭則仿〈定論〉而作《朱子摘編》，並附朱熹悟後詩作以前後呼應。

《傳習錄》全書內容主要包括王守仁與幾位弟子之間問答的紀錄，以及一部分王守仁與其他學者的書信辯難，既不像高文典冊般艱澀難懂，又十分易於上手，士人不僅可以藉此接觸到跟程朱學不同思路的新說，王守仁與弟子之間一問一答的方式，也幫助士人問出他們心中的疑惑，並代讀者把問題作了釐清與解釋。⁴⁴《傳習錄》一開卷的地方，就是王守仁與其弟子徐愛的問答，並聚焦在《大學》改本與古本的問題上，剖析朱熹改「新民」與王守仁「親民」說之間的不同，此後更涉及對「格物」的理解，以及其他種種解經方式的異同，這些對《大學》版本與經文解釋的疑惑所作的剖析與解釋，正可作為士人學習的指引。關於《大學》的討論只佔《傳習錄》一部分的篇幅，其他還有王守仁所反覆闡明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等說，以及拔本塞源論、成色分兩說、天泉證道等等，最後收束於〈朱子晚年定論〉，這些都是王學學說的精華，也是當時最受矚目的新說。透過這些概念的提出，不僅成功介紹與定義了王學，同時更一層層的剝開程朱學學說的束縛，把新舊兩說之間許多糾纏不清的關係重作釐清。

在與弟子的問答紀錄中，王守仁往往採取非常明快、一針見血的作法，一刀截斷新舊兩說的糾纏關係，對聽者與讀者而言，這都是一種能夠刺激思考並重新質疑舊說的機會，尤其在程朱學已經主導思想界數百年之後，更可藉此突破成見、重新審視與反思其說。以王守仁與其得意弟子徐愛的問答為例，徐愛是最早跟隨王守仁學習的人，很早就聽過王守仁談他自己的許多思想見解，這些思想見解對當時人顯然非常新奇穎異，甚至可能很少有人想過，因此乍聽其說並不容易了解。在王、徐二人的問答中，儘管王守仁幾次向徐愛反覆解釋其說，但徐愛所能領悟者仍然有限，王守仁不得不感歎「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徐愛最後雖在不斷與王守仁的互動下有所悟入，但仍然感到「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⁴⁵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胡瀚身上，胡瀚是餘姚人，與王守仁同鄉，他十八歲就向王守仁問學，而在王守仁授其致良知之學後，他必須「反覆終日」，才終於躍然而起，表示「先

44 如劉元卿在接觸王學以後，閉門考索先儒語錄，卻無所得，於是毅然投入劉陽門下。這裏所說的先儒語錄，應也包括《近思錄》在內。《明儒學案》，頁498。

45 《傳習錄》，頁2-19。

生之教劈破愚蒙」。⁴⁶顯然舊說與新說之間存在十分微妙而難以截然二分的關係，也因此王守仁必須採取果斷明快的手法，把己說與舊說的關係截然劈斷、分成兩途，凸顯己說的殊異性；加上他作〈拔本塞源論〉、〈朱子晚年定論〉，反覆申明新說大不同於舊說之處，以及舊說的宗主朱熹晚年自悔其說的故事，更進一步加深讀者的印象，認為新說優於舊說，而且兩說頗有扞格不能相容之處。

當時在人手之間流傳的《傳習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與指引的功能，人們可以自修的方式研習《傳習錄》迅速掌握王學要旨，這種利用小冊子闡揚己學的方式，不僅可在短時間內吸引更多讀者的眼光，另一方面，王學強調個人的自得與悟入，不太注意師承的關係與學術的淵源，因此留給讀者自我發展的空間甚大，即便無法親自拜入王學門下或聽其講學，仍可透過這本小書掌握王學的精要，並且迅速了解當時熱烈討論的重要議題，而摩挲熟讀此書使其可更容易打入王學的學術社群中。透過《傳習錄》的流傳，王學的影響層面迅速擴大，包括仕紳、中下層士人乃至於布衣平民，許多人都曾讀過這本小冊子，也透過這本小冊子而接觸王學。蔡汝楠（1516-1565）說：「傳習一編，斯道之輿，載道有具，唯人自驅」，⁴⁷很生動地說明了《傳習錄》的功能與特色。

這類事例頗多，姑舉幾例。遠在河南的尤時熙（1503-1580），因為當地未有著名王學學者，他便透過閱讀《傳習錄》而接觸王學。他讀了以後，「浸讀浸入，浸入浸透」，此後更於「齋中設文成位，晨起必焚香拜，來學者必令展謁」。⁴⁸而他也常與人往來討論，如問人：「陽明先生語近看又如何？」陽明先生語當指語錄即《傳習錄》而言。⁴⁹如泰州學派的健將羅汝芳，他年少時便以道學自任，學習各種屏息私念的工夫，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甚至還因此生了重病，他的父親見他如此，於是示之以《傳習錄》使讀，他的疾

46 《明儒學案》，頁329。

47 蔡汝楠，〈陽明先生像贊〉，《自知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冊，卷15，頁11。

48 張元忭，〈河南西川尤先生墓誌銘〉，尤時熙，《擬學小記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卷上，頁30。

49 尤時熙，〈答李兩山三〉，《擬學小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卷4，頁14。

病才得痊癒。⁵⁰又如新淦諸生饒良士，因為準備舉業生病而懷疑是否應以科舉之學竟其終身，後來閱讀《傳習錄》發現「道至邇至易矣，舍是他營，是謂大惑」，於是一心向學，不再顧戀功名舉業。死前還念念不忘此書，遺言吩咐放一本《傳習錄》在他棺中，「以識吾志」。⁵¹

吉水羅洪先也提供了一個例子。羅洪先從小便因心慕羅倫而有志於聖學，他所慕的聖學，自然是羅倫所屬的程朱學陣營所定義下的聖學。⁵²他當時尚未接觸王學。等到王守仁在正德年間展開其講學活動後，首先吸引不少吉安土人遠道前往其故鄉浙江會稽問學，⁵³此後王守仁擔任南贛巡撫，由於南贛恰與吉安相毗鄰，更激起許多吉安地方土人前往問學的決心。此時羅洪先年方十四，正隨其姻親姐夫周汝芳學習舉業，由於周汝芳曾師王守仁，便常利用習舉業之便為羅洪先講解王學，使得羅洪先也起了往南贛問學之念，不過被其父羅循大力阻止。羅循反對的理由不詳，但推測跟他希望羅洪先全心準備舉業，以及羅循本身的學術立場傾向程朱學有關。所以等到嘉靖四年（1525）羅洪先以書經舉江西鄉試第八十名，因父疾而輟次年會試，居鄉在家無所事事時，羅循便要羅洪先拜入李中門下。從羅倫到李中，都是當地著名的程朱學者。⁵⁴

但羅洪先並未從此拘泥在程朱學的格套中，他仍然透過其他管道接觸王學這門新興的學術。儘管當初企圖前往南贛聽講不果，但羅洪先仍然透過周汝芳取得《傳習錄》一書，「讀之忘寢食」，⁵⁵尤其對〈答羅整菴少宰書〉一

50 《明儒學案》，頁781。

51 羅洪先，〈明故饒良士孫烈婦合葬志銘〉，《念菴文集》，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5冊，卷16，頁9-10。

52 《明儒學案》，頁388。

53 當時三舍劉氏的子弟前往越中問學的多達十餘人，包括劉文敏、劉邦采、劉曉等人，以及尹一仁，都見（同治）《安福縣志》卷11，頁4、12、13、17；曾忭事蹟見（乾隆）《泰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清道光六年刊本影印），卷21，頁18。

54 以上請見《平溪羅氏四修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一經堂木活字本），卷3〈行誌·左贊善羅文恭公行誌〉，無頁碼；《明儒學案》，頁389；胡直，〈念菴先生行狀〉，《衡廬精舍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卷23，頁5-6。

55 根據《平溪羅氏四修族譜》：「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兒周汝芳為訓舉業法，始習舉業。配泥田大俊卿曾直女。後汝芳師王文成公，於庭時時為語學問正傳及龔元亨篤力處，文恭公於是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平溪羅氏四修族譜》，卷3〈行誌·左贊善羅文恭公行

文頗有感動。⁵⁶周汝芳只有舉人功名，與羅洪先同輩，兩人分別是吉水同水鄉泥田周氏與黃澄溪羅氏兩大家族的年輕子弟，這些年輕子弟彼此私下交流著長輩所不贊成的王學資訊，而《傳習錄》正是主要的憑藉。

羅洪先的故事並非特例，當時不少吉安士人都因讀過這本小書心嚮往之，甚至前往問學。如安福三舍劉氏的劉曉，他是吉安地區最早拜入王守仁門下的人，當正德年間王守仁在浙中講學時，劉曉正任新寧令，他不惜棄官前往問學，並與王守仁身邊的兩名弟子徐愛（1487-1517）、薛侃（1486-1545）彼此切磋討論，⁵⁷此後更帶回王守仁的「論學語」，推測其內容除了劉曉個人所錄的筆記外，應還包括徐愛、薛侃二人與王守仁之間的問答紀錄，⁵⁸這些問答紀錄後來更被編入成為《傳習錄》的主要內容之一。他所帶回的「論學語」，則廣泛流傳於三舍劉氏的年輕子弟手中。與劉曉同族的族人劉文敏（1490-1572），他二十三歲時與族人劉邦采共同學習，思考如何能夠自立於天地間，為此甚至焦慮煩惱而無法入眠，直到他讀《傳習錄》接觸到王學的思想，發現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於是「展轉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此後他又感到有親承師授的必要，便動身前往浙江會稽，從此就一意以致良知為鵠的了。⁵⁹三舍劉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同樣也受影響，紛紛跟隨劉文敏的脚步歸入王學陣營。安福北鄉歐陽瑜亦偕其兄歐陽璉前往浙中王守仁門下問學，回鄉後眼見當地鄉里可與討論王學的同志不多，所以在得知

誌》，無頁碼。）又據《明儒學案》載：「幼聞陽明講學虔臺，心即向慕，比《傳習錄》出，讀之至忘寢食。」錢德洪則指出：「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素志也。」（《明儒學案》，頁388-389）可知羅洪先年十四時，因周汝芳的緣故而知王學，並欲往南贛拜謁王守仁，被其父母所阻，於是讀《傳習錄》而習王學。據此羅洪先從周汝芳處取得《傳習錄》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作此推測。

56 羅洪先，〈答周洞巖〉，《念菴文集》卷3，頁70。

57 （同治）《安福縣志》，卷11〈儒林〉，頁12。根據《年譜》記載，王守仁在正德九年（1514）任南京鴻臚寺卿，且次年便北上京師，可知劉曉是在此年前往求學。而據族譜載劉曉是「挂冠往受業焉」，因此可知他是在任新寧令後前往的，請見《三舍劉氏六續族譜》（成都：巴蜀書社，據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影印），卷30〈家傳八〉，頁28。

58 據方志載，劉文敏從劉曉處得讀劉曉所錄的王守仁論學語與《傳習錄》。不過《傳習錄》最早的版本是正德十三年（1518）由薛侃編輯而成，當時尚無此書。劉曉在浙中問學期間，既常與徐愛、薛侃等人往來切磋學術，因此推測所謂的《傳習錄》應指徐、薛與王守仁的問答而言。請見（同治）《安福縣志》，卷11〈理學〉，頁4；與卷11〈儒林〉，頁12。

59 《明儒學案》，頁431；王時槐，〈兩峰劉先生志銘〉，《友慶堂合稿》卷3，頁52。

南鄉劉邦采等人也曾赴浙中後，更不惜遠下南鄉與其印證學術，而在沒有講學同志時，便「昕夕惟玩文成公所著《傳習錄》一帙，即使應試亦必攜以往」，⁶⁰後來他還常在包袱中裝數冊《傳習錄》行走路上，人呼為賣藥客，他則說自己是賣書而非賣藥，至於所賣的當然是《傳習錄》。⁶¹同樣的，吉水劉方興因慕王守仁的良知之學，於是拜南贛王學學者黃弘綱（1492-1561）為師，黃弘綱則授其《傳習錄》。此後劉方興更回吉安府走訪鄒守益、聶豹等人，聽其講學。⁶²羅洪先的兩位得意門生羅文祥因得王守仁格物論，讀後率弟同拜入羅洪先門下，⁶³文江兩生之一的趙弼也是讀《傳習錄》有感，毅然思自樹，不甘逐庸流。⁶⁴

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顏鈞（1504-1596）也是一例。顏鈞是吉安府永新縣人，他的兄長顏鑑是地方上小有名氣的學者，當他在白鹿洞接觸王學學說時，親自抄錄了一份《傳習錄》帶回家中給顏鈞參考，而這本小書卻改變了顏鈞的一生。顏鈞這位識字不多的布衣平民，在讀了《傳習錄》以後便開始致力儒學的講學與教化工作，積極「聚眾講耕讀孝弟」，並立萃和會，受召集來聽講的人甚至達七百人之多，而他所講的正是受《傳習錄》啟發的心性之學，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已經「老者八九十歲，牧童十二、三歲，各透心性靈竅，信口各自吟哦，為詩為歌，為頌為贊」，而值得注意的是，顏鈞在此之前不曾聽過講學，僅僅透過《傳習錄》接觸王學，即使後來參與青原講會，也跟與會者理念不合，不能接受其說，但卻已在教化工作上收到「喧赫震村谷，閭里為仁風」的成效，⁶⁵《傳習錄》的自修、參悟與實踐，才是顏鈞教化鄉里的動力來源所在。這也正好印證前文所說的，在講學活動已觸及或未觸及的地方，可以藉助像《傳習錄》這類小書，讓那些自修《傳習錄》有得的人憑藉自己悟出的道理向人宣講，轉手再傳播給沒有機會透過閱讀而接觸王學的下民了解。

60 《續脩安福令歐陽公通譜》（上海圖書館藏），〈理學志·三溪公傳〉，頁15-17。

61 〔萬曆〕《吉安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卷28〈隱逸傳〉，頁12-13。

62 胡直，〈平樂府節推劉公墓誌銘〉，《衡廬精舍藏稿》卷25，頁17。

63 羅洪先，〈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6，頁6-7。

64 羅洪先，〈文江兩生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5，頁8-9。

65 黃宣民，〈顏鈞年譜〉，《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122-123。

當時《傳習錄》的流風所及，即連僧人或傾向佛學的士人也受其影響。僧人中有讀《傳習錄》有悟的：「(法聚)居天池山二十餘年，登坐說法，趨道者甚眾。……好爲韻語，忽自謂出家兒當爲生死，嗜此何益？遂誓志參學，觀陽明《傳習錄》，謂與禪禮不殊，乃以偈趨叩，陽明以偈答之。」⁶⁶至於傾向佛學的士人則可以萬曆年間的吉水羅大紘為例，羅大紘雖是王學陣營中一份子，但其學術雜染了非常濃重的佛學色彩，在他談到為學歷程時便指出，自己年輕時也曾苦心參究程朱的格物之學，雖然時有自得，但終究感到格物與致知不相干涉，為此困擾不已，但即使如此，他仍不敢疑心是程朱解經出了問題，反而認為自己的資質太過魯鈍不能領悟。等到弱冠之年，友人贈他一本《傳習錄》，羅大紘一讀之下，「便與神契，若自暗室睹白日」，於是每天捧在手上玩習。儘管不久他又感到致知與格物不相連貫，二十年後才又因讀佛學使他大悟而積疑盡除，但他仍下結論表示，自己所悟的雖與《傳習錄》稍異毫末，「然非《傳習錄》推開眼翳，終死在宋儒窠臼不得脫也」，「則王文成爲百世之師，豈顧問哉！」⁶⁷這裏幾乎把王守仁與孔子等同齊觀，都以百世師尊之了。

當時《傳習錄》的流傳甚廣，常見王學學者或在書院、⁶⁸或藉任官之便而在任地刊刻《傳習錄》。⁶⁹至於《文集》與《文錄》也具一定的影響力，受這些書啓發影響者也不少，如永豐劉籌的兒子劉煥文，本身只是諸生的身份，但在讀過《文集》、得聞良知之學以後，便前往鄒守益、羅洪先門下學

66 蘇晉仁、蕭鍊子選輯，《歷代釋道人物志》(成都：巴蜀書社，1998)，總頁359。

67 羅大紘，〈東撫臺王公〉，《紫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9冊，卷6，頁30。

68 一些傾向王學的高級官員如胡宗憲，甚至資助王學學者在書院刊刻《傳習錄》等書：「(總制胡公)命同門杭貳守唐堯臣重刻先師《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惠諸生。」見鄒守益，〈天真書院改建仰止祠記〉，《東廓鄒先生遺稿》(嘉靖末年刊本)，卷4，頁5-6。當時常見當父親的人用語錄來教育子女的紀錄：「余兒時家君每課以東廓先生言，時余未知其何謂也，稍長始知家君曾受學東廓先生，因竊至教，想望其風，……」許吳儒，〈世德作求尚友千古冊〉，鄒德涵，《鄒聚所先生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頁58。

69 如錢鶴洲(號)任江陰知縣時便與當地王學學者薛甲合作，刊刻《傳習錄》以廣其傳。請見薛甲，〈刻傳習錄序〉，《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6，頁17-19。並請參見下一節的討論。

習。⁷⁰前述尤時熙本人雖因《傳習錄》而有悟，但仍常讀《文錄》，⁷¹而他教子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求其子常看《文集》，⁷²這跟鄒守益命子讀《傳習錄》的作法相當類似。此外，《王陽明年譜》也成為許多王學信徒求道過程中的參考手冊——在宋明理學的傳統中，年譜常有修身借鑑的功用，因此參詳某人的年譜，便是參詳他道德奮鬥的過程。⁷³這幾本書在傳播乃至於幫助士人了解王學上，都扮演了相當份量的角色。

除了與王守仁直接相關的著作以外，王學學者也常有許多講學語錄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王學學者之間還經常互贈語錄。⁷⁴敘述個人求道心路歷程的文章也很通行，如羅洪先的〈冬游記〉與〈夏游記〉這兩篇自述為學歷程的短文就不斷轉手流傳於學者、士人之間，人們不僅藉此窺見作者的學術根基造詣，更可因此而有所感發領悟。⁷⁵胡松（1503-1566）便自述在讀過羅洪先的冬夏兩遊記與論學書信後才了解羅洪先的苦心孤詣，在「所以憂墮溺，捄謾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其淫且蕩者，真復抉腎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⁷⁶而如尤時熙的《擬學小記》，雖然內容多是他個人的學術心

70 (同治)《永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卷25，頁8。

71 尤時熙，〈上晴川劉師〉，《擬學小記續錄》卷3，頁13。

72 尤時熙，〈寄示洙兒〉，《擬學小記續錄》卷3，頁37。

73 見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1998): 245-294。

74 如左派王學的代表人物羅汝芳（1515-1588）便常贈人王艮（1483-1540）的語錄。他曾藉靈濟宮講學之便贈送共同與會的楊應詔兩冊《王心齋語錄》。楊應詔事程朱學者呂柟，而對王畿、王艮等人的學術稍有微詞，羅汝芳應是希望藉語錄使他對王艮的學術能有所改觀。請見楊應詔，〈與羅近溪書〉，《天游山人集》，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13，頁13-16。

75 相關討論請見 Pei-yi Wu,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3-141.

76 胡松，〈刻念菴文集序〉，《胡莊肅公集》卷2，頁3。如聶豹就特別刊刻〈夏遊記〉並為其作序。見聶豹，〈刻夏遊記序〉，《雙江聶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2冊，卷3，頁17-18。如鄒守益也把〈冬游記〉連同《大學》古本、《或問》等書寄給學生作為求學的參考。見鄒守益，〈又與董生兆時〉，《東廓鄒先生文集》卷5，頁48。如熊過在寫給羅洪先的好友唐順之的書信中談到他讀〈冬游記〉的感想：「見此兄〈冬游記〉，殊為懇切，未附龍溪數語，則雖覺其自出少異，然沈著痛快。」（熊過，〈與唐荊川書〉，《南沙先生文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1冊，卷4，頁29。）

得，但這本書卻在地方上與聖諭六言、《聖諭衍》這些教民書籍同時刊刻流傳於鄉間里甲之間。⁷⁷

必須指出的是，包括《傳習錄》在內的這些小冊子的流傳與講學活動兩者是並行不悖的，閱讀的熱潮並不因為講學活動的流行而有稍歇。在王學講學尚未盛行以前，不少士人固然必須透過《傳習錄》的閱讀才有接觸王學的機會，但即便王學聲勢已經如日中天、講學活動頻仍之際，《傳習錄》仍然不失為接人入門的最好指引。如安福鄒守益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讓他們讀《傳習錄》，其長子鄒義正是受這本小書的啟發才積極參與講學活動。如羅洪先的幾名弟子——趙弼、羅汝奎等人，儘管已經跟隨在羅洪先身邊學習，但還是靠讀了《傳習錄》以後才毅然決然下定決心，亟思有所樹立。⁷⁸即連萬曆年間安福王學的後進劉元卿，先是考索宋儒語錄，但無所得，於是轉而披讀《傳習錄》而有悟，並且毅然決定外出問學，最後拜入湖北王學學者耿定向（1524-1596）門下，終成一代大儒。⁷⁹

五、吉安程朱學者的對抗或轉向

綜合以上所談的，王學對於程朱學的挑戰除了思想上的創新以外，在行動上則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講學，一是《傳習錄》這類小冊子的刊刻傳播。此處便專以吉安一地為例，說明程朱學者的對抗與轉向的實況。

77 尤時熙，《擬學小記續錄》卷4，頁54-55。

78 羅洪先，〈文江兩生墓志銘〉，《念菴文集》卷15，頁8-9；〈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同前書，卷16，頁6-7。

79 黃宗羲（1610-1695）指劉元卿「考索於先儒語錄，未之有得也」，若據鄒元標所作墓誌銘可知此「先儒語錄」即宋儒語錄。請見《明儒學案》，頁498；與鄒元標，〈瀘瀟劉先生墓誌銘〉，《南溪劉氏續修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清崇本堂木活字本），〈祠墓紀〉，頁12。劉元卿向其友劉應峰談到自己後來讀《傳習錄》有悟的過程：「迺蚤莫觀王氏《傳習錄》，輒回視返聞，以求所謂心體者，久若有睹注，則心自沾沾喜，以為道在此。」劉元卿，〈又簡劉養且先生〉，《劉聘君全集》卷2，頁2。即使到了民國年間，錢穆還特別為《傳習錄》作一節要，希望讓已經不習慣閱讀古籍的一般大眾有更多接觸王學的機會。見錢穆，〈講堂遺錄〉（上），《錢賓四先生全集》丙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222；錢穆，〈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9），頁95-123。

吉安在經歷宸濠之亂與王守仁巡撫南贛講學以後，吸引許多中下層士人前往問學，緊接著安福惜陰會的舉行，意味王學開始以建制化的形式傳播其學，此後講會、書院逐一成立，王學可以更具草根性的方式在當地紮根，不少未曾外出求學的人也可就近得到接觸王學講學的機會與資訊，而不少人也因此而信從王學。吉安王學學者常選擇在府縣城或鄉里交通便利處建立書院，⁸⁰一些從其他鄉里前來參與講學的人，還常抱怨交通不夠方便，甚至乾脆就近建立書院的。惜陰會的舉行，乃至於書院的成立，都使王學勢力得到更進一步的擴展，相對的吉安當地程朱學者的勢力範圍則日漸萎縮。

至於《傳習錄》則常被當作打開程朱學缺口的一項利器。王學學者常藉任官之便，在程朱學勢力強固的地區刊刻《傳習錄》等書，達到攻擊對手與傳播學術的目的。如浙江一帶學術頗受莊詠、章懋（1436-1521）等程朱學者的影響，所以王守仁在世時，便曾特地與莊詠的女婿王巴山（號）論學，由於此人是莊詠的女婿，加上頗有學識，在後輩學者中很有影響力，「若轉得巴山，則六合之士皆可轉矣」，⁸¹鄒守益形容當時王守仁「忍咳與談，談劇復咳，咳止復談」，至於效果如何則未知。不過《傳習錄》對其學在當地的流傳倒是頗有助益，當時越中「學濂洛者，矩範有章先生（懋）在，不敢越步武，新建（王守仁）說出，群喙爭鳴爲異端」，與王守仁的及門弟子徐愛並稱江左二徐的蘭溪徐袍，他雖未曾拜入王守仁門下，但「獨嗜其旨，手《傳習錄》爲贊」，毅然以學自樹立，並影響其族而成家學，傳至其孫徐學聚常與王

80 安福分作東、南、西、北四鄉，而當地的幾所重要書院，多位於水路幹線流經之地。若從西鄉始，中道會館位於洋溪這個交通樞紐之地，往西南走四十里即復禮書院，相反的若沿洋溪往東北接瀘水，便可直達橫屋的識仁書院，再沿瀘水往東到縣城附近，城北有宗孔書院，城內則有復古書院。瀘水再往東經梅田則是東鄉道東書院，此後南向過洋口再折而往東，鄰近的蒙潭有同善書院，再沿舟湖水往西走可達舟湖的復真書院，若再繼續西行到彭坊鄉，再轉陸路也可腳接中道會館與復禮書院。除了復禮書院與中道會館之間的交通必須轉經一段陸路以外，從中道會館、識仁書院、宗孔書院、復古書院、道東書院、同善書院、到復真書院，都位於水路系統的幹線上。而除了復古書院作為縣城書院，其餘的幾間書院正是復古以外最重要的四鄉書院。而除了復古書院作為縣城書院，其餘的幾間書院正是復古以外最重要的四鄉書院。見（同治）《安福縣志》卷5，頁10：「按書院惟復古公於一邑，若東之道東，南之復真、同善，西之識仁、復禮、中道，北之宗孔，則又各鄉所建者。」

81 鄒守益，〈簡歐南野崇一〉，《東廓鄒先生文集》卷5，頁27。

學學者往來，並在萬曆年間任吉水知縣時為當地的王學學者鄒元標建仁文書院。⁸²

福建八閩之地也是程朱學的重鎮，即使在王學全盛時期，當地程朱學者其指仍繁，相繼有蔡清（1453-1508）、陳琛（1477-1545）、林希元（1481-1565）、張岳（1492-1552）等人起而主持學術，以致他們得意地宣稱——「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有鑑於此，聶豹、朱衡兩位王學學者先後都藉任官之便，順勢把王學傳入，而他們選擇刊刻的書籍之一，就是《傳習錄》與古本《大學》這兩本小書，⁸³聶豹更興建養正書院作為倡學之地。⁸⁴同樣的，宋儀望（生卒年不詳，1547年進士）督學閩南時，不僅時時與學校諸生講說王門學術，並特地把《傳習錄》這本小書加入《文粹》在學校中刊行，同時刊行的還有鄒守益、歐陽德二人文選，⁸⁵做法與聶、朱二人如出一轍。對於陝西呂柟（1479-1542）一支的程朱學術，宋儀望也挾巡按陝西之勢，大舉刊刻《陽明先生文集》、《陽明先生文粹》等書。⁸⁶

程朱學者對於《傳習錄》所帶來的閱讀風潮與震撼未始沒有警覺。《明史》說：「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大夫多力排之。」⁸⁷力排其學的士大夫中有不少就是程朱學者，如福建林希元，他與王守仁同時，他師承蔡清

82 鄒元標，〈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晉贈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願學集》，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卷6上，頁35-37。

83 聶豹，〈重刻傳習錄序〉，《雙江聶先生文集》卷3，頁1-2；〈重刻大學古本序〉，同前書，頁4-5；朱衡，《朱鎮山先生集》（明萬曆十九年刊本），卷15，頁11-14。

84 聶豹，〈重建養正書院記〉，《雙江聶先生文集》卷5，頁25-28。

85 曾同寧，〈嘉議大夫大理寺卿華陽宋公墓誌銘〉，《泉湖山房稿》（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卷22，頁10。

86 宋儀望，〈河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華陽館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卷1，頁7-9；宋儀望，〈刻陽明先生文粹序〉，《華陽館文集》卷1，頁9-11。在此之前，嘉靖二十九年（1550）有閩東在此刊刻《文集》，他指出：「《陽明先生文錄》舊刻於姑蘇，《傳習錄》刻於贛，繼又有薛子者（薛侃）刻其《則言》，然相傳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併以觀全書，每有餘憾。東按西秦，……盡取先生《文錄》，附以《傳習錄》并《則言》，共若干卷，刻之。」閩東，〈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卷首，《陽明王先生文錄》。轉引自吳震，《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 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2003），頁170。

87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283〈儒林二·尤時熙傳〉，頁7286。

所主張的程朱學術，因此對《傳習錄》一書攻擊不遺餘力。⁸⁸同時也有許多人利用個人對王學的了解與經歷轉而攻擊王學，如徐學謨（1522-1593）的老師殷子義，本受致良知說的感動，但後來懷疑其說，認為「知亦有次第」，於是「更宗紫陽」，轉入程朱學陣營，徐學謨在其師墓誌銘中寫其心路歷程：

先生之學初宗姚江，若有味乎致良知之說，以儒者之方便法門在是，已悟中庸三知之指，謂知亦有次第，生知既不恒有，藉令學知而下盡去聞見，而虛事揣摩，其能以徑造乎？乃更宗紫陽，而少□其支離，以符會於孔氏博約之訓。⁸⁹

另一位著名的反王學者章袞（生卒年不詳，1523年進士），更直截了當的表示王學終究是不如程朱學的，因為最初「一時之心目雖若開明，特久之滋味自覺蕭索，且凌高厲空，無可執著，而陽明務穎晦翁以信其說，或不暇詳考其始終條理，而力攻其一言一節之差，或不肯深求其立言之本意，而亟議其影響依似之末」。⁹⁰

朱熹的鄉人休寧汪尚和也曾對朱、王兩家之學有過一番反省，說：

尚和亦嘗從學於陽明王先生，王先生講知行合一之義，切中時學浮泛之病，顧學者聽之不審，傳之太過，遂至於貶吾朱夫子焉。尚和是以深痛之，倣伊洛淵源，有是錄也，使天下後世知朱夫子與一時門弟子問答者，固非若今之論矣。⁹¹

汪尚和儘管曾受學於王守仁，聞其「知行合一」之旨，但因朱、王兩家分立的結果，使他不得不仿《伊洛淵源錄》，另作《紫陽道脈錄》倡導程朱學，他所反對的「今之論」則更暗指收入《傳習錄》中的〈朱子晚年定論〉。

由於王學利用《傳習錄》等書大肆傳播己說與攻擊程朱學，徐問遂在廣東程朱學者黃佐（1489-1566）的鼓勵下，寫作《讀書劄記》第2冊以闡王守仁之說，並跟程朱學大家羅欽順就此事交換意見。⁹²值得注意的是，徐問儘

88 《四庫全書總目》，頁1577。

89 徐學謨，〈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歸有園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5冊，卷6，頁25。

90 章袞，〈章介菴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1冊，卷11，頁15。

91 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0冊，卷3，頁23。

92 徐問，〈答羅整菴先生〉，《山堂續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4冊，卷3，頁10-11。

管極不喜王學，並曾向羅欽順抱怨「王氏之學本諸象山諸餘，至今眩惑人聽，雖有高才亦溺於此」，認為此為「道心不明，仁義否塞，而世道污隆之機」，故作《讀書劄記》第2冊，但如四庫館臣指出：「今核其所闡各條，大都託之『或謂』，又稱為『近學』、『世學』，而並未斥言。蓋是時王學盛行，羽翼者眾，故問不欲顯加排擯。」可以想見當時王學勢力之大，與流行之盛，竟連徐問這位關心世道污隆的程朱學者也不願直擗其鋒。⁹³此外也有人將朱熹的文字擇其要者撮為《朱子文抄》一書梓行以利傳播其學。⁹⁴

吉安府也有反王學的勢力，其中泰和羅欽順最可為代表。羅欽順長年居官在外，在他被奪職為民後，他先以書信多次與王守仁辯論格物致知之旨，王守仁的回信收入《傳習錄》卷中的〈答羅整菴少宰書〉，羅欽順有鑑於《傳習錄》的流傳之速與吉安中下層士人受其影響之大，於是著手刊印他所作的《困知記》這本小冊子。⁹⁵王守仁的弟子歐陽德因與羅欽順同鄉，在收到羅欽順所贈《困知記》以後，兩人之間又發生一番激辯。⁹⁶

羅欽順的這些努力最後並未發揮太大的作用。一方面在於他回應王學的時機似乎已晚，王學在中下層士人間的勢力已成，不易再被撼動，所以當時已入老境的羅欽順所辯論的對象，竟是當地歐陽家族的年輕子弟歐陽德，兩代之間似已有鴻溝存在。另一方面，《困知記》雖然受到一些仕紳、尤其是

93 以上請見徐問，〈答羅整菴先生〉，《山堂續稿》卷3，頁10-11；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792。

94 呂柟，〈晦菴朱子文抄序〉，《涇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1冊，卷13，頁12-14。

95 關於羅欽順與王守仁的書信問答，以及《困知記》與《傳習錄》刊刻時間的對照，請見山下龍二，〈陽明學の研究——展開篇〉（東京：現代情報社，1971），頁113。

96 歐陽德，〈答羅整菴先生寄困知記〉，《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0冊，卷1，頁14-24；歐陽德，〈冢宰整菴公八十壽〉，同前書，卷20，頁1。關於羅欽順與王守仁、歐陽德之間的辯論分析，請見錢穆，〈羅整菴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頁45-67；羅欽順思想的研究，請見鍾彩鈞，〈羅整菴的理氣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1995): 199-220；〈羅整菴的經世思想與其政治社會背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1996): 197-226；〈上海復旦大學藏《整菴續稿》及其價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5.3(1995): 137-141。而尹星凡使用了《闕城羅氏族譜》簡略敘述了羅欽順的生平，頗有參考價值，請見尹星凡，〈羅欽順及其《困知記》〉，鄭曉江主編，《江右思想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230-241。

程朱學者的重視與讚賞，⁹⁷但其影響力以及對一般中下層士人的吸引力恐怕還是不如《傳習錄》來得大，所以我們很少見到中下層士人閱讀這本書有所得或受感動的記載，至於因讀《困知記》而轉向程朱學的例子就更少見了。即使如吉安知府張振之「學必宗朱說」，以官方力量倡導程朱學，命令學校諸生研習《困知記》等書，但效果仍然十分有限。⁹⁸

吉安程朱學者無法成功回應王學挑戰的窘境，使得許多原本支持程朱學的人也逐漸受到這股學風的影響而改變立場。王學在吉安府得勢乃至於大盛，加上王學又喜群聚講學，聲氣相感相應的結果，當地程朱學者更形勢單力孤，也因此某些程朱學者如羅欽順，乾脆閉門不再參與當地的學術活動，⁹⁹下迄萬曆年間，泰和當地幾乎已無其學術勢力，此時唯一力主校刻《羅欽順文集》的王學學者劉淵，所持的理由是「程朱正脈豈可遂廢」。¹⁰⁰又如吉水羅僑，眼見王學從初興到日盛，便在嘉靖十二年（1533）以鄒守益為首舉行青原山講學時應邀前往，並與在座人士論辯不已，但終究無力回天。至於與羅僑同縣的李中乾脆以生病為由婉拒了鄒守益的邀請，並轉往他地養病與教授程朱學了。¹⁰¹程朱學在當地聲光之黯淡可見一斑。

97 如尹臺、歐陽鐸這些在學術上比較同情程朱學的仕紳學者。尹臺，〈太宰羅整菴先生壽榮錄序〉，《洞麓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7冊，卷1，頁35-37。歐陽鐸，〈困知記後序〉，《歐陽恭簡公文集》，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4冊，卷5，頁2-3。又如崔銑這位程朱學者在讀了《困知記》以後很高興的寫信給羅欽順，表示：「今之論學者行其書矣，右象山，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歎顏子之後無傳，銑雖未之敢從，恒以寡昧自疑。及得我公《困知記》，讀之抉邪有據，申正造精，乃自信而立，自今苟存一日，或進跬步，皆奉明訓，感佩不忘，輒以此意，敷衍成詞以獻。」崔銑，〈與太宰整菴羅公書〉，《洹詞》卷10，頁15。

98 (萬曆)《吉安府志》卷17，頁9-10。府志上記載張振之「在郡三年，忽不自憚，遽棄官歸」，也許跟他想在王學的大本營吉安府推廣程朱學的效果不佳有關吧！

99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67，頁2。

100 (光緒)《吉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元年刊本影印)，卷31，頁36。當時吉安府司理劉憲寵署泰和縣令，並主持泰和縣丈量覈田的工作，因此也協助刻此文集。曾同亨，〈贈郡司理行素劉公考績序〉，《泉湖山房稿》卷6，頁9；〈劉司理署太和縣覈田記〉，同前書，卷13，頁27-30。

101 嘉靖十三年（1534）安福鄒守益與永新甘公亮都力邀李中參加青原講學，但李中皆以病辭。而同年李中則在隨州報恩寺講程朱學。李中，〈答鄒謙之〉，《谷平先生文集》卷3，頁19；〈與甘太守欽采〉，同前書，卷3，頁21；〈朱學問答〉，同前書，卷5，頁14。

王學在吉安流行的過程中，最初遭遇不少人的反對，其中有來自地方仕紳，也有來自傾程朱學者，但隨著小冊子的流傳，許多傾向程朱學的人也漸向王學靠攏，受到古本《大學》這本小書影響而轉向的尹臺（1506-1579）就是一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尹臺「攻擊姚江之學甚力」，「亦可謂屹然不移」，將其歸入程朱學陣營。¹⁰²但尹臺的學術其實曾有變化，使他變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王學學者的言行事為，一是古本《大學》。關於尹臺學術轉變的記載如下：

尹臺，字崇基，號洞山，永新人，……明年，陞南祭酒，……遽改北，道三茅，時鄉士胡直為句容教諭，……語曰：吾嘗以新學墮言語鮮躬行，邇歸，頗有觸於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塵塵不妙，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先是嘗割腴田三百畝入社備賑，復歸乃別建鳳西書院，又割田四百畝給來學，早極崇信紫陽（朱熹），躋泰和羅文莊公（羅欽順），獨至中年，因有寤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二公語合，晚年益以明學為首務，讀書至老不倦，為文概主六經，而體裁一準西京，詩歌儕建安天寶間無辨。¹⁰³

嘉靖三十三年（1554）尹臺擔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期間曾回吉安一趟，參與鄒守益、羅洪先等人事主持的講學活動，目睹王學講學的盛況，是促成其改變的關鍵，曾同亨在此有記載：

初公之遷南，入家展省，艤舟吉水，期鄒文莊、羅文恭兩公，與郡薦紳四方之士訂道術玄潭道院，昕夕弗倦。¹⁰⁴

第二年他改任北京國子監祭酒，途中恰遇泰和王學學者胡直（1517-1585），兩人相談竟日，尹臺很感歎的坦承他對王學的改觀：「吾嘗以新學墮言說，鮮躬行，邇歸，頗有觸於鄒、羅二公，且見諸士中操節塵塵不妙，則又喜曰：學在吾郡，因重相勗。」¹⁰⁵所謂「有觸於」鄒守益、羅洪先二人，應指學術上的討論而言，我們參考前引的資料就更清楚了：

（尹臺）早極崇信紫陽，躋泰和羅文莊公，獨至中年，因有寤於《大學》知本之旨，浸與鄒、羅二公語合。¹⁰⁶

102 《洞麓堂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頁2。

103 同註99，卷68，頁27-29。

104 曾同亨，〈南京禮部尚書洞山尹公神道碑〉，《泉湖山房稿》卷21，頁27。

105 同註99，卷68，頁28。

106 同註99，卷68，頁29。

原本崇信程朱學的尹臺因讀《大學》這本小書改變立場，而他對《大學》的注意又跟王守仁標舉古本《大學》一事有關，所以他的領悟漸與鄒守益、羅洪先等人的意見相契合，同時與程朱學者如羅欽順等人漸行漸遠。古本《大學》影響之大又是一證。

尹臺的學術轉向以後，對書院講學的態度也轉趨積極。尹臺指出：「比歲郡諸邑士並倡講會，興正學，所在重書院之建」，而其效果則是「士爭相濯磨，其效彬彬著盛」，這跟前述尹臺有感於「諸士中操節塵塵」的自白正好相映，顯示講學對士人的教化效果甚彰，並已得到尹臺的注意。但先前尹臺眼見永新的學術活動相對於安福等縣「獨絀焉」、「莫之興舉，矜佩歎以爲恥」的現象，儘管心中頗多感慨，卻遲遲沒有採取任何具體行動。等到他從南京歸鄉，有悟於《大學》之旨，學術轉向王學陣營以後，終於積極主張講學，甚至與知縣合作共同建立崇正書院，「使一邑士眾講會周旋其間」，包括會規也模仿安福復古、復真兩書院的會規內容而定。¹⁰⁷

除了書院的興建以外，尹臺還致力於家族救濟與鄉里建設上，當時尹臺雖在南京任官，但「思以社法糾里族」，因此與在地土人戴有孚合作，並由戴有孚總其事。戴有孚，永新梅田人，其家族屬於當地的名門望族，族高祖戴禮、與其祖父戴僖，都是進士出身，¹⁰⁸所以有能力負責這類事，加上戴有孚本身也會跟隨安福的王學學者劉邦采、王時槐等人講究理學，在學術的內在要求下，於是欣然答應，並慨然以爲己任，捐貲割田，不遺餘力。據說里社完成運作以後，「禮讓蒸布，訟爭不作，里父老咸義其行」。¹⁰⁹

六、結論

一門學術能夠流行並取得主流地位，其學術內容是最基礎也最關鍵的部分，倘若其學說並無太多創造或吸引人處，並不易引起大規模的流行。尤其王學面對程朱學的既定勢力，不僅必須挑戰程朱學，更須在學說有所創造，有所樹立，才可能在明中晚期眾說競逐的思想場域中開出一片天地。但一門

107 尹臺，〈崇正書院記〉，《洞麓堂集》卷4，頁9-10。

108 (乾隆)《永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一年刊本影印)，卷8，頁19。

109 同上註，卷8，頁32-33。

學術的成功，還必須加上一些外在的條件與優勢，其中講學活動的流行，以及《傳習錄》與古本《大學》等書的刊刻流傳二事，正是王學得以在正德、嘉靖年間迅速流傳的重要助力。本文把焦點集中在後者。

明中晚期許多人因讀《傳習錄》或古本《大學》而接受王學，許多傾向程朱學的人也因此轉入王學陣營。古本《大學》的爭議，有效區隔開王學與程朱學的不同，並為人們解答了許多存於心中難解的疑惑，而《傳習錄》涵括王學最重要幾個論題的討論，也使人們透過閱讀可以馬上對王學學說有初步的上手。因此在江右王學的重鎮吉安府中，包括羅洪先這些學術領袖以及不少中下層士人在內，都是透過這些書籍接觸甚至接受王學，而王學學者除了利用講學傳播己說並挑戰程朱學以外，同時也把戰線延伸到書籍的流布與閱讀上。講學活動的舉行常受到時空與人數的限制，相對的，書籍流布的範圍則甚廣泛，對學說傳播所能發揮的效果遂甚可觀。尹臺學術的轉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也凸顯了在講學活動以外，書籍流布對學說的傳播及其對時人的影響，都頗具意義與重要性，值得做更深入的研究。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小學集解》，臺北：世界書局，1971。
- 明·尹臺，《洞麓堂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 明·尹襄，《巽峰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7冊，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 明·尤時熙，《擬學小記／附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9冊。
- 明·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7冊。
-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臺北：大申書局，1983。
- 明·王守仁，《傳習錄》，臺北：金楓出版公司，1987。
- 明·王時槐，《友慶堂合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4冊。
- 明·朱衡，《朱鎮山先生集》，明萬曆十九年刊本。
- 明·呂柟，《涇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0冊。
- 明·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

- 明·李中，《谷平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1冊。
- 明·汪循，《汪仁峰文集／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7冊。
- 明·胡松，《胡莊肅公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1冊。
- 明·胡直，《衡廬精舍藏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7冊。
- 明·徐問，《山堂續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4冊。
- 明·徐學謨，《歸有園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5冊。
- 明·崔銑，《洹詞》，《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67冊。
- 明·章袞，《章介菴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1冊。
- 明·曾同亨，《泉湖山房稿》，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 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56冊。
- 明·黃佐，《小學古訓》，《嶺南遺書》，清道光三十年刊本。
- 明·黃宗羲，《明儒學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 明·楊應詔，《天游山人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臺北：明文書局，1991。
- 明·鄒元標，《願學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4冊。
-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5-66冊。
- 明·鄒守益，《東廓鄒先生遺稿》，嘉靖末年刊本。
- 明·鄒德涵，《鄒聚所先生文集／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7冊。
- 明·熊過，《南沙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1冊。
- 明·劉元卿，《劉聘君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4冊。
- 明·歐陽德，《歐陽南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80冊。
- 明·歐陽鐸，《歐陽恭簡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64冊。
- 明·蔡汝楠，《自知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7冊。
- 明·薛甲，《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聶豹，《雙江聶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2冊。
- 明·顏鈞，《顏鈞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明·羅大紘，《紫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9冊。
- 明·羅洪先，《念菴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75冊。
- 明·羅欽順，《困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0。

- (萬曆)《吉安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據明萬曆十三年刻本影印。
- (萬曆)《溫州府志》，臺南：莊嚴文化出版公司，據明萬曆刻本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11冊。
-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乾隆)《永新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乾隆十一年刊本影印。
- (乾隆)《泰和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道光六年刊本影印。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
- (同治)《安福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影印。
- (同治)《永豐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
- (光緒)《吉安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清光緒元年刊本影印。
- (廬陵)《平溪羅氏四修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一經堂木活字本。
- (安福)《三舍劉氏六續族譜》，成都：巴蜀書社，據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影印。
- (安福)《續脩安福令歐陽公通譜》，上海圖書館藏。
- (安福)《南溪劉氏續修族譜》，上海圖書館藏清崇本堂木活字本。

二、近人論著

- 山下龍二 1971 〈陽明學の研究——展開篇〉，東京：現代情報社。
- 尹星凡 2003 〈羅欽順及其《困知記》〉，收入鄭曉江主編（2003），《江右思想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230-241。
- 王汎森 1997 〈清初思想趨向與《劉子節要》——兼論清初蕺山學派的分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8.2: 417-448。
- 王汎森 1998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245-294。
- 吉田公平 1990 《陸象山と王陽明》，東京：研文出版社。
- 余英時 2004 《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余英時 2005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吳震 2003 《明代知識界講學活動繫年 1522-1602》，上海：學林出版社。
- 呂妙芬 2003 《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 史研究所。
- 李紀祥 1988 《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李紀祥 2001 〈入道之序：由「陳（淳）、黃（幹）之歧」到李滉《聖學十圖》〉，《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24: 241-337。
- 林麗月 1992 〈科場競爭與天下之「公」：明代科舉區域配額問題的一些考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0: 43-74。
- 高橋進 1977 《朱熹と王陽明——物と心と理の比較思想論》，東京：國會刊行會。
- 盛朗西 1977 《中國書院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
- 陳來 2003 《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陳榮捷 1982 《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 曹松葉 1929 〈宋元明清書院概況〉，《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111-115。
- 錢穆 1979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錢穆 1995 《講堂遺錄》（上），《錢賓四先生全集》丙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
- 繆詠禾 2000 《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鍾彩鈞 1995 〈上海復旦大學藏《整菴續稿》及其價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5.3: 137-141。
- 鍾彩鈞 1995 〈羅整菴的理氣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6: 199-220。
- 鍾彩鈞 1996 〈羅整菴的經世思想與其政治社會背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8: 197-226。
- 蘇晉仁、蕭鍊子選輯 1998 《歷代釋道人物志》，成都：巴蜀書社。
- Chartier, Rog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1991.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Mark U. 1994. *Printing, Propaganda, and Martin Luth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bvre, Lucien, and Henri-Jean Martin. translated by David Gerard. 1976.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N.L.B.
- Wu, Pei-yi. 1990. *The Confucian's Progres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in Tradition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ng Yang-ming School of Thought from the Middle through Late Ming Dynasty: The Circulation of the *Chuanxi lu* and Old Edi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and Its Effects

I-hsi Chang *

Abstract

The Wang Yang-ming 王陽明 school of thought was very popular from the middle through late Ming Dynasty period. Even the Cheng Zhu 程朱 school, recognized officially as orthodox, could not compete with it during this time.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uperiority of Wang Yang-ming's school over the others is that it had its own distinct and creativ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innovations. Those thoughts and innovations were spread and promulgated by Wang Yang-ming himself and his disciples through public lectures. The impact of these lectures on their contemporaries have been noted recently by modern scholars.

Other than the public lectures,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had yet another way to make itself known. There were numerous booklets printed throughout the Jiangnan 江南 region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inting technology since the Song Dynasty. For example, the *Chuanxi lu* 傳習錄 and old edi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 大學, spread extensively and were widely available. By reading these two booklets, people could

* I-hsi Chang holds a doctorate from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earn Wang Yang-ming's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ir own. This was most convenient in areas where people were unable to attend the public lectures of Wang and his disciples.

In the *Chuanxi lu*, Wang Yang-ming's most influential thoughts are recorded. As for the classic *The Great Learning*, Wang Yang-ming revived its old edition with his own commentaries, as opposed to Zhu Xi's 朱熹 revised edition. These two works created a major shock in the current intellectual world. They played no less important of a role than the public lectures. Some people even converted to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simply because of reading these two booklets. The Ji'an 吉安 school is a good example that will be discussed further in this paper article.

In general, most people have been impressed by the Wang Yang-ming school because its public lectures. This paper, however, will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se booklets also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popularity of the school and dissemination of its philosophies, and this phenomenon is worthy of further study.

Keywords: *The Great Learning*, *Chuanxi lu* 傳習錄, Wang Yang-ming school of thought 陽明學, Ji'an 吉安, Ying Tai 尹臺